

策划编辑：党晨飞
责任编辑：王建华
封面设计：马吉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六国人物研究 / 戴晓刚著.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226-04746-0

I. ①十… II. ①戴… III. ①历史人物 — 人物研究 — 中国 — 十六国时期 IV. ①K820.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028540 号

出版人: 吉西平

策划编辑: 党晨飞

责任编辑: 王建华

封面设计: 马吉庆

十六国人物研究

戴晓刚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244 千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ISBN 978-7-226-04746-0 定价: 36.00 元

前 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重要历史时期，而位于其中之十六国时段尤其因其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而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尽管十六国的历史地位异常显著，然因传统文献中关于此一历史时段的史载极其稀缺（此乃主要由于封建士大夫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的历史影响的缘故），遂致自古以降学人对十六国史的研究极为稀疏。

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十年以来，学界已日趋重视十六国史的研究，一批力作相继问世，如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齐陈俊《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然至今尚未见到十六国人物方面的专著。

有鉴于此，本书正是在认真吸纳学界前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积十多年之功力，主要依据笔者期间通过初步探究业已发表的十余篇关于十六国人物研究方面的小论文，并加以潜心梳理、补充完善、归纳综合而逐渐形成

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此一成果仅为十六国研究领域的一个大胆的探索而已，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本书专门选取十六国历史上颇具典型说明（代表）意义的后赵石勒、前秦苻坚和后秦姚兴三大人物展开系列研究，这是因为后赵、前秦和后秦正是十六国时期均因其厉行改革（依次史称“（后赵）石勒改革”、“（前秦）王猛改革”和“（后秦）姚兴改革”）而颇具政治影响力的三个前后依次相继的国家。所以，探究此三次改革的发起者石勒、苻坚和姚兴，不仅可以进一步拓展“中古”人物史的研究范围，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古”政治改革史的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整体把握；广言之，谈古论今、以史为鉴，探究历史上的改革风云人物，除了具有莫大的历史意义之外，更可以为当今改革新形势之下之治国理政提供较大的政治借鉴，由此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此亦为拟撰本书之根由。

本书的研究程序为：首先就十六国前期后赵的开国者石勒与汉族士人的两面性关系及其重农之政等重大为政之道问题进行剖析，接着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十六国中后期前秦苻坚和后秦姚兴的汉文化修养、以“德”治国及其用人之道等重要问题，最后又对苻坚和姚兴二人汉文化修养的共同特征、结构差异等相关问题做出了简明扼要的比较研究。全书紧扣“为政之道”、“汉文化修养”等核心问题，陈陈相因、渐次铺陈、逐一阐发，旨在进一步探求十六国历史上著名的统治者石勒、苻坚和姚兴的治国之道的发展规律及其本质特征和历史影响等重大问题，进而企求拓展十六国史研究的视野。

最后尤需说明的是：因《太平御览》所辑之崔鸿《十六国春秋》早已残缺不全，且其内容多与《晋书》诸载记重复，而魏收《魏书》之所载亦寥寥数语，遂致撰修本书所能凭借的旧史参考文献极为稀少。正由于旧史文献的极度匮乏，致使研究十六国人物史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加之笔者学识及时域之所限，因此深感本书在诸多方面还不够完善，挂一漏万之嫌较多，敬祈方家教正。谢谢！

戴晓刚

2014年12月谨识于甘肃陇东学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石勒研究 …… 001

一、石勒与汉族士人 / 003

(一) “士” “士人”概说 / 004

(二) 石勒优崇汉族士人 / 006

(三) 石勒诛戮汉族士人及其主要原因 / 017

二、石勒之重农 / 022

(一) 石勒重农的历史和社会大背景 / 022

(二) 石勒的重农之政 / 026

(三) 石勒重农的主要原因 / 031

第二部分 苻坚研究 …… 035

一、苻坚的汉文化修养 / 037

(一) 苻坚(颇具)汉文化修养的历史及社会大背景 / 038

(二) 苻坚(颇具)汉文化修养的家族背景 / 042

(三) 苻坚的汉文化修养 / 045

(四) 苻坚(颇具)汉文化修养的家族影响 / 056

二、苻坚以“德”治国 / 061

(一) 苻坚以“德”治国的历史及社会大背景 / 062

(二) 苻坚以“德”治国的基本构思 / 069

(三) 苻坚以“德”治国的基本实践 / 074

三、苻坚之崇儒 / 095

(一) 苻坚崇儒的历史及社会大背景 / 096

(二) 苻坚之崇儒 / 106

第三部分 姚兴研究 …… 125

一、姚兴的汉文化修养 / 127

(一) 姚兴先辈的汉文化修养 / 127

(二) 姚兴的汉文化修养 / 135

二、姚兴之用人 / 150

(一) 姚兴的用人之道 / 151

(二) 姚兴用人的主要失误 / 163

第四部分 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修养的比较研究 …… 177

一、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修养的共同特征(相似性) / 179

(一) 汉魏晋时期儒学的渐趋式微 / 179

(二) 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修养的共同特征——崇儒兴学 / 182

二、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修养的结构特征(差异性) / 186

三、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修养的历史影响及其现代启示 / 190

第五部分 胡叟的人物形象研究 …… 195

一、胡叟人物形象问世的家族背景 / 198

二、胡叟的儒士形象 / 201	
(一) 辨疑释理, 尤精《易经》 / 201	
(二) 贬评后世之儒, 力主弘扬传统儒学的创新精神 / 203	
(三) 熟知孝文化, 力行孝道 / 205	
三、胡叟的文士形象 / 206	
(一) 工诗善文, 特征显著 / 207	
(二) 常与名士交往, 以文会友 / 208	
四、胡叟的隐士形象 / 209	
(一) 隐逸、隐士及隐逸文化概说 / 209	
(二) 胡叟的隐士形象 / 212	
五、胡叟隐士形象的基本成因 / 214	
(一) 汉魏晋以降大量出现隐逸风尚的影响使然 / 215	
(二)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痼疾”的影响使然 / 217	
(三) 中国传统隐逸思想、中国古代士人的价值观及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精神的影响使然 / 218	
参考文献 ·····	223
后记 ·····	227

第一部分

石勒研究

后赵石勒不仅在整個十六国时期是与前秦苻坚齐名的较为杰出的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者，是十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①，而且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堪与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等汉族王朝的明君圣主相媲美的极具传奇性的历史人物。石勒由一个地位极为卑微的“田奴”，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高超的军事才能，一步步地迈进了成功之路，终于称王称帝，创建了十六国前期著名的国家之一——后赵，成就了其极为辉煌的人生历程。

在十六国历史的研究中，后赵石勒是与前秦苻坚一样为学界所非常关注的人物，就近年以来业已发表的学术论文而言，具有代表性的大约有十余篇之多，计有：韩国磐《谈谈石勒》（《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张先昌《石勒评价商榷三题》（《晋阳学刊》1986年第3期），李智文《石勒改革略论》（《河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李廷芝、谢占杰《实事求是看待石勒故里——三说石勒是和顺人》（《晋阳学刊》2007年第6期）等等。

本部分（内容）在认真吸纳学界前辈、同仁学术成果的基础之上，主要依据笔者近年以来对石勒的粗浅研究之所得，并加以补充完善而成，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石勒进行专题探究。

一、石勒与汉族士人

“士人”乃是指中国古代（尤指其中之“中古”时代）内涵极广、影响极大的一个社会阶层，汉、魏以降其作用日益显著；“士人”阶层在五胡十六国历史上的地位尤其异常突出，他们与十六国政治风云密切相关。所以，研究十六国中之“士人”与统治者的关系问题，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史问题，而且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史问题。而在十六国历史上，后赵石勒与“士人”的关系问题更具有特

^① 韩国磐：《谈谈石勒》，《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殊而重大的意义，即颇具开创性意义。以下拟从三个方面予以阐论。

（一）“士”“士人”概说

何谓“士”？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云：“士，事也。”《白虎通义·爵》亦释：“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可见最初“士”与“事”可以通假；最初之“士”是指氏族正式成员。自国家产生之后，“士”逐渐演变为贵族官员的通称。自西周以来，“士”主要包括各级贵族，譬如《诗·周颂·清庙》云：“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孔颖达疏云：“济济之众士，谓朝廷之臣也。”《尚书·泰誓》：“公曰：嗟，我士。”伪孔传释云：“誓其群臣，通称士也。”《礼记·表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明顺则臣有顺命。”以上史籍所言之“士”皆泛指受命之臣。

简言之，自上古三代以来，受命于天子或诸侯而居于官位者皆可称之为“士”。因此，“士”就既可以为受有爵命者的臣之总号，又可以指身份世袭的整个贵族阶级，包括其未受命的子弟。

“士”有时还指“庶士”，《礼记·丧大记》：“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孙希旦《礼记集解》疏云：“庶士，谓未命之士，《燕礼》所谓士旅食者也；”章学诚《春秋左氏释义答问》卷3释云：“大夫皆已仕，士则兼容未仕者也。公之昆弟，虽不仕，亦未夷为庶人，故通以士概之。”如此云云。

《左传》、《国语》等文献里更有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种等级序列的表述，此即表明统治集团内部已分化为不同层次。此时之“士”仅对天子而言为“士”，当其供职于王廷之时则位为“卿士”。《礼记·曲礼》（下）：“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郑玄注云：“亦谓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于天子为士。曰某士者，如晋韩起聘于周，傒者曰晋士起。”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一分化已使“士”此一原可以包容所有贵族成员的通称继续演变、分化，其地位高者已别做称呼（“卿士”等），而“士”本身则进一步发展成为贵族与官员的最低等级之称呼了；换言之，当时业已出现了“上士、中士、下士”之分。

尤其重要的是，此一时期的“士”，除了指称具有任事者的政治意味之外，还具有了指称拥有知识演艺者的文化意味。例如，《春秋谷梁传》之“成公元年”条：“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范宁注“士民”曰“学

习道艺者”；杨士勋疏引何休之说曰“德能居位曰士”，意即“德”为“士”之居位任事者所必备之知识素养；“德”的获得尤须通过“学习道艺”。也就是说，至此，“士”与“事”、“士”与“学”均有了密切的关系；“士”对政治事务的垄断和在文化修养上的优势，反映出了此一群体角色上的功能分化，诚如阎步克先生所言：“在封建时代，文化教育为贵族士大夫所集中拥有，士被视为学习道艺者或德能居位之人，他们是与小人相对的君子。……许多证据表明，春秋后期的许多场合，士、君子之类语词的身份意味经常地变得淡漠了，而日益强调其道艺的一面。”^①

“士人”，笼统地讲，是中国古代对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亦明确地称为“儒士”、“文士”等。就中国古代士人的组成（成分）及其作用，孙立群先生之论较为精深：“中国古代士人的构成是复杂的。士人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处于官与民之间，他们可上可下，其活动促使文化传播和社会关系活化。士人内部构成的复杂性和士人社会职业的多样化，不仅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各异，其品德、性格也各不相同。……”“构成中国古代士人的主体是在各类学校就读的学生和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类举子，如生监、秀才、举人等；还有从事各种文化活动的人，如教师、作家等。由于中国古代许多官员是儒生出身，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他们在社会上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是国家官员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社会文化的继承者，他们既能研读经史，又能参与国家管理，还能有出色的诗赋文章传世。一般认为，儒者、文官、诗人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的典型品格。”^②

论及中国古代“士人”的主要身份及其本质特征时，王永平之论较为精当：“‘士人’乃学术文化之载体，在通讯和交通等信息交流手段较为落后的古代社会，学术文化的传播一般情形下都是借助于‘士人’的流动来实现的。”又：“士人之为士人，其主要的标志就在于他们具有承继和传播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他们身上往往会体现出与其他阶层不一样的特性，孔子所说士当‘舍生

^①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

^② 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5页。

取义’，孟子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这都指出了士人之特质。而最根本的‘大义’和‘恒心’就在于国难家祸的生死关头，仍不忘传承民族文化之血脉。”^①

本部分所说的“士人”，主要是指由汉末“名士”演变而来的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仕人”。

（二）石勒优崇汉族士人

十六国时期正处于“五胡乱华”的高涨时期，此十六国亦多由“五胡”所建立。反映此一时期的史籍多由汉族人编写而成，所以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偏见，他们往往过多地描写这段历史的黑暗面，而较少地反映其光明面，由此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历史，从而给后人学习和研究此段历史带来了一定的“误区”，也给历史本身造成了不良影响。石勒的情形正是如此——

一方面，当今许多史家已明确指出，石勒是十六国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较为难得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如著名魏晋南北朝史专家韩国磐先生即明确指出：“石勒是十六国割据政权中的佼佼者。在他的统治下，固然有凶残的一面，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成就还是较大的。他曾在劝农和租调、用人专任、学校选举、礼乐法令等方面采取过一些积极的措施，他自己的思想和识见也有过人之处。……就其成就来说，他和苻坚一样，是十六国前后期中两个最突出的人物，只是具体情况各不相同而已。”^②

但另一方面，遍阅《晋书》《十六国春秋》及《资治通鉴》等旧史相关记载，就会发现记载石勒的黑暗面很多很多，而记载其光明面则甚少甚少，尤其是在谈论石勒与汉人的关系时过多地渲染他如何大杀汉人的一面，而对其优宠汉人的难得的另一面则语焉不详！有鉴于此，在此专门对此一问题做以全面阐论，以澄清涉及石勒是非功过评价上的重大历史问题，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1. 石勒优崇汉族士人

石勒颇得用人之道，而打破士族门阀的等级限制，着力延揽汉族士人、重用

^①《略论东吴时期侨寓士人的文化贡献》，《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②韩国磐：《谈谈石勒》，《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庶族地主乃其用人之道的显著特征。石勒生逢“五胡乱华”异常剧烈的十六国前期，当时胡汉矛盾十分尖锐。然而，此一时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大都出于统治需要以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接受汉文化，确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之所论：对于胡族统治者来说，“要统一汉人，就要推崇汉化；要汉化就要推崇汉人，而推崇汉人莫过于推崇士族”^①。石勒的情形亦正如此。

石勒尊崇汉文化、笼络汉族士人早在其起兵不久即已开始。克冀州后，石勒即令“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加以保护；称汉王后，又“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华族”（《晋书·石勒载记》）。石勒原本不识字，却倾心向学，《晋书》本载记概称“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之中，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

（1）优崇张宾

石勒优宠的汉族士人莫过于张宾，对此，韩国磐先生已有定论：“石勒得张宾而专任他，得用人唯贤之意。”（《魏晋南北朝史史纲》）

张宾字孟孙，赵郡中丘人也，其父瑶官至中山（郡名，治今河北定县）太守，《晋书·石勒载记》附传载张宾“少好学，博涉经史，不为章句，阔达有大节”，有器量才干，曾于兄弟间夸言：“吾自言智算鉴识不后子房，但不遇高祖耳。”

时值“永嘉之乱”爆发，汉刘渊拜石勒为辅汉将军，率部属攻略山东。“山东”士人张宾洞察时局变化，历数当今英才，然后明确告诉亲属们说：“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指石勒，因是胡人出身，故有此称）可与共成大事。”有鉴于此，张宾“乃提剑军门，大呼请见（石勒）”。（《晋书·石勒载记》）

尽管张宾求见心切，但初次见面后石勒并未以之为奇，然通过一番考察，石勒确认张宾有真才实干（“宾数以策于勒，已而皆如所言”）之后，“后渐进规模，乃异之，引为谋主，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②。身为冀州“君子营”中的重要成员，张宾初任参军都尉，步入石勒政权的军政行列；后

^①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7页。

^②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附张宾》，中华书局，1974年，第2756页。

擢为右长史，位次将军；后赵初建，又加号“大执法”^①，封濮阳侯，继之以加“中垒将军”，号曰“右侯”。

尽管石勒对张宾“任遇优显，宠贯当时”，而张宾却始终保持着襟怀坦白、戒骄戒躁的为政作风：“谦虚敬慎，开襟下士，士无贤愚，造之者莫不得尽其情焉。肃清百僚，屏绝私昵，入则格言，出则归美。”也正由于如此，“勒甚重之，每朝，常为之正容貌，简辞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与为比也。……”

石勒对张宾极其尊崇且一往情深，可惜的是张宾于322年过早地病故。惊悉张宾故世的噩耗，“勒亲临哭之，哀恻左右，赠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曰景。将葬，送于正阳门，望之流涕，顾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耶，何夺吾右侯之早也！’”^②其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毋庸置疑，信用张宾而不疑乃是石勒优宠汉族士人之典型例证。对于张宾的建言，石勒多以“右侯之言是也”或“右侯之言从也”等语给予采纳。譬如，时值晋末中原大乱、冀并兖司四州流人数万户逃至辽西且迭相招引、人不安业之际，石勒曾令部将孔苾力图用武力进攻的方式来解决，然久攻未克，情急之下问计于张宾，张宾冷静地回答说：“……今宜班师息甲，差选良守……奉宣仁泽，奋扬威武，幽、冀之寇可翘足而静，辽西流人可指时而至。”^③意即应采取“奉宣仁泽，奋扬威武”的恩威并施、双管齐下的方式解决辽西流人问题。石勒及时纳取了张宾的这一意见，以“右侯之计是也”作答。事实上，正是由于及时听取了张宾之策，以故“冯睹率众降于勒”，“流民归之者相继于道”，辽西局势因而渐趋稳定。

张宾最有价值的建议乃是由于石勒事业发展的关键期，能够及时奉劝石勒先经

①“大执法”一职乃石勒所创。此言之“执”，意即“执掌”“总管”；此言之“法”，意即“制度”，其含义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诸领域。由此可见，“大执法”一职大体相当于秦汉以降之“丞相”；此职务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职权极重，即所谓“专总朝政，位冠僚首”也。所以，张宾能被任命为“大执法”，充分说明石勒对他的优宠之重！

②《晋书·石勒载记下·附张宾》，中华书局，1974年，第2756页。

③《晋书·石勒载记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2726页。

营河北以图进一步发展。据《晋书》本载记，“勒于葛陂缮室宇，课农造舟，将寇建邺。会霖雨历三月不止，（晋）元帝使诸将率江南之众大集寿春，勒军中饥疫死者太半”，形势非常严重，石勒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忐忑之际，石勒顾谓张宾曰：“于君计何如？”宾曰：

将军攻陷帝都，囚执天子，杀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将军之发不足
以数将军之罪，奈何复还相臣奉乎？去年诛王弥之后，不宜于此营建。
天降霖雨方数百里中，示将军不应留也。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
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
之右者。晋之保寿春，惧将军之往击尔，今卒闻迴军，必欣于敌去，未
遑奇兵倚击也。辎重迳从北道，大军向寿春，辎重既过，大军徐迴，何
惧进退无地乎？

张宾此言可谓高屋建瓴、一语中的，关键时刻及时提出正确的作战方针，深刻分析了当时石勒与东晋双方的政治、军事形势变化，打消了石勒的顾虑，坚定了石勒发展事业的信心，石勒于是饶有风趣地说：“宾之计是也。”

对于张宾之言石勒尽管已表示赞同，然因部分将佐仍存异议，所以为了彻底打消石勒及部分将佐的顾虑，经深思熟虑之后，张宾明确提出了“先取邯郸、襄国”（暂时舍弃三台）的战略构想：

刘演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则能自溃。王彭祖、刘越石，大敌也，宜及其未有备，密规进据罕城，广运粮储，西廩平阳，扫定并、蜀，桓、文之业可以济也。且今天下鼎沸，战争方始，游行羈旅，人无定志，难以保万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则群凶可除、王业可图矣。^①

^①《晋书·石勒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716—2717页。